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 网址 www.nbrb.com.cn
责任编辑/李磊明 电话/87685227
电子信箱/llm@cnnb.com.cn

弘扬人文精神:城市文化建设的人文指向

□徐定宝

本期特稿

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热潮中，先进文化的培育与提升已成了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既有赖于“硬件”物质载体的搭建，也需要“软件”精神氛围的营造。如果说，前者的不足或欠缺可在城市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完善与提高，甚至有可能达到超前发展的程度，那么，后者的良好形成与精心培育，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努力过程，而且完全要以社会主体的精神自觉为前提。应当把提升与弘扬表现时代进步的人文精神视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指向。当代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其外延也十分丰富，若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看，这种人文精神则主要反映在城市的人文环境、人文素养、人关怀等方面，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审视与探索，既有助于社会正能量的释放，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看清城市文化的人文指向。

人文环境是人文精神的生存基础，呈现着城市生活的文化氛围

人文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产生过莫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欧洲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先后发生过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其间形成了同中世纪封建宗教势力相悖逆的人文环境，这种具有浓重近代色彩的人文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诸国的工业化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发生于上世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掀起过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人文思潮，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与胜利埋下了伏笔。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拨乱返正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人文环境，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大好局面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全球经济态势的新变化，世界在步入高科技与网络时代之后，又出现诸多新状况，尤其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同样处于全面复苏与质量提升的阶段，也面临着如何推动经济与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新问题。因此，期待出现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文环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和迫切。我们已经看到：观念与理念的创新、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体制与机制的创新、转型与升级的创新等，已成了时代的强烈呼声，而这一切创新，归根结底还得以文化创新为基础。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集中体现于具有创新内涵的人文精神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亟需大力鼓励敢于探索及宽容失败的思想与实践，既要倡导有利于创新的风气与习俗，又要培植容许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相应的有效机制。现代都市若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就难以使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看到，当下城市人文环境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对原创精神的冷漠。究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心态中，还普遍存在着对创新失败所带来后果的深切担忧，甚至是严重恐惧。对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今社会能大力褒奖创新的成功典范，自然是必须的，也应予以高度肯定。但是，若对创新失败持不宽容态度，创新者由此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是无情地打击了创新的热情，创新行为与举动的出现，也会因之而锐减。大家知道，创新有可能成功，但失败的几率也不低。创新一旦遭遇失败，就可能导致创新主体付出巨大代价，则有可能使个体或群体对参与创新望而生畏。这样的社会环境非常不利于创新思想的萌发与创新实践的进行，而且还往往是急功近利、乐于模仿、怕冒风险、忌贤妒能等陋习与积弊，难以从根本上扫除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从社会文化心态上看，长期来存在着的“失败恐惧症”，已经严重滞阻了科技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当重视与保护原创精神，积极有效地消除“失败恐惧症”，努力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并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相应的体制与机制。整个社会需要培植和倡导对创新失败能予以理解与宽容的文化心态，同时，要注重有利于让创新失败最终转化为成功的文化背景与政策机制，这已非人们一般性的社会责任，而是城市主体为营造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文环境所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对此，务必予以高度重视。

人文素质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标志，显示着城市群体的精神面貌

一般地说，人的素质常取决于科技素质与人文素质。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普遍注重科技素质的提高，尤其在城市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科技能力与知识水准往往成为在激烈社会竞争中自身所处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重视学习技能与知识，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个体寻求良好生存环境的必然之路。但应当看到的是，科技素质的提高往往是以人文素质的提升为基础。无论在中国抑或世界的科技史上，凡是为人类科技进步与社会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他们超乎寻常的牺牲精神与不计个人得失的心灵境界，是他们摘取时代最高文明成果的精神保障。相反的事例更不胜枚举，有些人虽然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与某种技能，却因人文素质的低下而做不出多少成绩，有的还走了歪门邪道，干了有损国家、有害人民的卑劣勾当，最终沦为社会的罪人。

我们也须明白，人文素质并不等同于人文知识，尽管在人文素质内包含着一定量的人文知识，但它更重要的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是人的内在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的整合。人文素质之所以存在“优”与“劣”的根本原因，并非出自其所获至的人文知识的多与寡，而是由个体的信念与理想所达到的境界所决定。因此，在人生的历程中，人文素质亦是主体全面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极”，是人的“正能量”的“集散地”，所以人文素质是由人的精神与思想所铸成，存在着正面提升与负面下滑的现象，直接影响着主体内在的素养与外在的形象，其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对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具有莫大的作用与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眼下在我们重视培育人文素质之时，尤其要关注人的“诚信意识”与“规则意识”，二者均关乎人的思想道德与行为习惯。诚信意识是指诚实守信，即个体在自身的社会实践中履行承诺并取得他人信任。可以说，诚信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而且还可视为普遍的思想行为规律。违反了这一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便无以凭依。因此，诚信既是国家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更是个人道德信誉和人格品位的象征与标志，正如孔子所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显示着个体的人文素养，被当作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交友之道，也是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无形资产”，又是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道德存在和赖以维系之前提，显然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要做到诚实可靠，信守诺言，讲究信用；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须践行待人至诚，做事认真，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诚信是道德素养中最重要的人文元素，在历史的进程中，曾是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道德规范，也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人人关注、并须努力培育与提升的人文素质中最关键的核心内容。

规则意识是指守规合则，即所谓的遵纪守法。规则意识是人的道德素养的重要外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比如，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若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也可视为公民回归规则意识的一场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其作用与意义不能低估。长期以来，在公民的道德修养中，经常缺位的常常是规则意识，传统观念中的“从众心理”、“法不罚众”等，往往成为人们规则意识淡漠的心里依据。一个在文明国度里生活的公民必须具备高度的规则意识，而规则意识的培育既需要外界强有力的制约，更需要人们视此为自身道德素养的重要内容而不断修炼，规则意识一旦成为普遍的公民道德素养，社会所追求的公平、公正与美好的生活现实就有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直接流露，体现着城市居住者的心灵诉求

综观当今都市的居住群体，若从经济地位着眼，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情形各异的高收入群体，另一类是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类是生计尚存问题的低收入群体。三类中的后者亦被称为“弱势群体”。就他们而言，由于多为城市普通的“打工族”及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因此生活尚处“温饱型”阶段、为他们提供就业及各种物质上的支持与关心，是这一群体的极大需要。但是，低收入群体在关注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同时，也非常渴求社会对他们的精神关怀，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期盼并不亚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尤其当他们身处窘境，孤立无援之时，精神上的关爱与慰藉，更能激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增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信心与力量。如果社会缺乏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他们会感到孤独无望，而且各种邪恶势力也有可能将毒手伸向他们，把其中的意志薄弱者推向罪恶的深渊。因此，给低收入群体以更多的社会关爱，不仅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社会稳固安定的需要。至于生活已进入“白领族”与“富贵型”的中、高端收入群体，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需求已能满足，也会更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同样需要社会的关爱。在都市生活中，还不乏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的人们，对他们需要提供健康的文化与精神食粮，使之在社会的关爱中领悟人生的真谛。

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把人文关怀当成双向流动的精神沟通，时有接受，也时有付出。不管都市中属于哪一类群体的成员，在心灵空间之中，随时会因爱的付出而获得莫大的精神满足，也会由于爱的关怀而感受人间的温馨。其实人们都需要在“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文化关爱中生活，充分享受人文关怀所带来的生活充实与精神愉悦，个体若能体悟来自群体与社会的关怀，就会产生心灵的感动与情感的温馨，这也是人们内心所期盼的一种生活质量。为此，不仅要大力提倡与宣扬人文关怀，而且还要努力寻求人文关怀的社会机制，促使社会成员，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有较为固定的约定时间与机会，去参加对弱者、病者、贫者、老者、孤者、寡者的关爱活动。同时，所有市民也都会在相对稳定的周期内与周边的人进行情感交流与思想沟通。因此，要致力于建立与完善人际情感交流与思想沟通的渠道和场所，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决心，坚决打破因现代楼群住宅给居住者造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门户封闭的格局，并积极探索社区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联系沟通机制，让体现人文关怀的各种活动逐渐变成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亟需积极而努力地探索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使我们的日常生活能不时地将人文关怀渗透其中，并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习惯。

我们也会想起近几年来曾发生过的不少令人心寒的社会现象，如那种人性冷漠、不肯救死扶伤、在他人生死关头袖手傍观等，从本质上讲，是人心自私的表现，与人文关怀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格格不入。但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各个领域也不断涌现出无数精神美丽人物，如“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女孩”等品行高尚者。他们无愧乎人文关怀的典范而被社会所赞颂，也是人际关爱精神可以永久传承的有力见证。提倡与弘扬社会的人文关怀，应当成为城市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

由此而见，积极营造人文环境、努力提升人文素质、大力倡导人文关怀，既是当代人文精神的本质内容，也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人文指向。我们中的每一位，皆应为之作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

（作者为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宁波大学教授）

2013年社科理论研究热点要览

观点聚焦

市场和政府职能需进一步合理界定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是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的要求。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政府怎么样管和在哪些事情上管，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还有学者认为，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科学的宏观调控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尽可能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也有学者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来表现、实现，比如通过价格杠杆、通过各种市场参数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等等。政府和市场的职能需合理界定，两个方面需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整个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转型式”改革：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

当今，我国处在历史大变革、结构大调整、格局大变动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学者认为，当前“公平正义性”改革，是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式”改革，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的“科学性”改革。公平正义改革理论是新历史起点上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必须从根本上对既往的改革思路和改革举措进行反思，全面而细致地清理一切妨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通过对“改革”的改革，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把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还给人民，才能使改革的逻辑起点真正复归到公平正义上来。

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升温

2013年政治学界对国家体制的关注正在逐渐从一般宪法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向侧重基本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转变。国家的社会监管能力和相关制度建设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认识到，要为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其必要前提在于需要国家具备一套优良的管制体制和充足的治理资源和能力。从政治学研究成果来看，产生了一批以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主题的一系列议题，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财税体制、再分配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又包括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反映时下改革热点议程的研究。

教育与就业公平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以最大公约数凝聚了社会共识，提振了民族信心，绘制了国家未来的美丽蓝图，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并通过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而使之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同时，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有学者指出，教育机会既影响着每一个人奋斗的起点的公平，也影响着每一个人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现代社会的就业，就是在教育文凭的分流中将人们安置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职业岗位上。所以，教育的公平与就业的公平才最终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法治中国”建设：崇尚“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引起宪法学界对法治国家建设与宪法实施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也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崇尚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即“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髓。从法理上看，法治国家主要还是从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职能角度出发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要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形成宪法共识，树立宪法权威。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

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走出去”。中国学者要扩大研究与交流视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科研成果，主动“引进来”；不仅不应在国际交流中缺席，还要主动“走出去”；既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还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为此，中国学者承担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可以利用角色和学术优势积极开展理论外交，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消除外国学者、政要、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误读”和“误解”，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良好形象。

研究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和现实价值

随着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不少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和现实价值进行了梳理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产生的。关于群众路线，我党历史上有三次系统总结，分别是党的七大、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有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进行了梳理后提出，群众路线思想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发展也受到挫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发展和提升；有研究者认为，通过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保持自身清廉、民主的强大武器，明确了如何做到为民服务的现实路径，明晰了中共自身的立党之本是为人民服务。

领袖人物思想的当代价值备受学界关注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不少研究者撰文纪念毛泽东，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思想渊源、继承发展关系；总结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对新中国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特别是群众路线思想、反腐倡廉思想等。

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了《习仲勋传》、《习仲勋画传》，拍摄了相关文献纪录片，对习仲勋光辉战斗的一生给予了全面梳理。不少人还撰文研究纪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史人物在革命生涯、建设年代和改革岁月的重要贡献。

网络发展的政治伦理与网络环境的法治监控

2013年对网络传播环境的治理引起有关网络伦理的讨论。学者们认为，网络发展的某些趋势，有助于现代政治伦理的时代精神、公民精神、主体精神、平等精神等伦理精神的建设和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网络给予进入网络社会的人们以道义上的平等权，促进了社会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分配上的平等与进步。同时，网络媒体的伦理价值具有两重性，即正、负两极性，网络媒体的负伦理价值时时困扰着人类，应关注网络媒体的负伦理价值的研究，在网络媒体造福于人类的同时，要防止网络媒体的负效应；面对网络媒体出现的情色传播和泛滥，网恋、网婚、网络情爱、网络谣言、网络言论非理性化等，应加强网络的立法监督和分类管理，尤其应当为广大青少年网民提供一片清朗的网络空间。

（李 伦）

理论漫谈

实干与干实

江 海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是当下的一个“热词”。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办好民生实事需要实干，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也需要实干。浏览近期各地“两会”报道，实干二字被频频提及，引发热议。

实干，是一种精神和智慧，是一种追求和境界，也是一种作风和重要的领导方法。回顾过去，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实干；立足当前，破解所有的困难和问题离不开实干；面向未来，我们再创新的辉煌也要靠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小平同志一语道出了实干的极端重要性。

实干的对立面是虚干。其表现或是重说轻干、只说不干，“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是见效快的多干、见效慢的少干，“有心种花，无心栽树”；或是上面关注的多干、上面不关注的少干，“只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满意”。我们无疑要积极支持鼓励实干，旗帜鲜明地反对虚干。

实干就一定能干实吗？也有人这样发问。仔细一想，意味深长。字序的变换，是理念的不同。过去，确有一些误区：有的认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实干；有的认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实干；还有的认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是实干。这是对实干的误读。拉车不看路就有走弯路、走错路、走邪路甚至是“车毁人亡”的可能，耕耘不问收获就有收成不足甚至颗粒无收的尴尬，走自己的路不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就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

办好当前的事情，无疑要继续提倡“愚公移山”式的实干精神。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看问题要有新视角，实干也要有新理念、新思路、新标准。过去一些地方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年复一年在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下功夫，但收效甚微、解困乏力。后来有的地方转换思路，通过实施下山移民等工程很快让群众安了家、致了富。思路一变天地宽，后者不也是很好的实干吗？

实干与干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是重要的方法、路径和基础，后者是根本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脱离后者，前者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有瞎干、乱干、蛮干的可能。一个地方要想取得让群众满意的发展，既要有大批苦干、实干的干部，更要有能把工作干实、干到位、干出成效的能人。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面对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不仅要以身作则带头实干，更要把实干作风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积极作为与尊重规律结合起来，把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善做善成，努力把工作干实。像“钉钉子”一样，钉准、钉牢、钉稳、钉好。

两者要统一，其实不容易。做事如作文，既要善于选准问题进行科学构思和谋篇布局，又要有下笔如神、力透纸背的功力和定力。心到、眼到、手到、力到、火候到，才能推出“精品佳作”。干事亦如打仗，既要有统率三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胆略和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勇气，更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本领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略战术。

实现两者的统一，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和氛围。这就需要通过建立科学的用人导向和工作实绩评价导向，引导更多的实干型干部不断提升干实的能力和水平，形成既重实干，又重干实的良好氛围。

把好“三关”，落实“舌尖上的安全”

修晓明

实践与思考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食品安全成为关注热词。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落实“舌尖上的安全”，就是要通过抓好产品源头、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大惩戒力度，注重把好质量关、监管关和惩戒关。

落实“舌尖上的安全”，根本是要抓好农产品质量源头，把好“质量关”。“民以食为天，食以质为先”。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头连着农民增收、粮食增产、农业增效，一头托着广大市民的饭碗菜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前些年出现的“三鹿奶粉”质量问题，让许多消费者家庭经历痛苦，使社会对奶粉行业失去信任、丧失信心，其负面影响至今余波难平，不仅沉重打击了我国的奶粉产业，也直接影响了作为奶源源头的奶农的利益。面对严峻的形势，必须要在农产品质量源头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努力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做好工业污染物的处理工作，关闭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特别严禁污染企业在国家主要的农牧区、农耕区投资设厂；积极做好引导，鼓励农民使用对环境、农产品负面作用少的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多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

落实“舌尖上的安全”，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把好“监管关”。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食品领域的监管涉及工商、质检、环保、公安等多部门，部门各司其职，既明确了相互之间的责任分工，也为堵住不合格食品设置多道关卡。然而现实中病死猪、注水肉、地沟油等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竟能频频突破多部门的一道道防线，归根到底是监管部门条块分割明显、体制机制不健全、配合不严密的结果。对此，应当着重打破部门间的条块分割，注重监管体制的完善、监管部门的密切配合和监管领域的全覆盖。同时，要加强监管体制创新。上世纪9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就已经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对市场上流通的食品都能进行追根溯源的监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也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制，使对食品的监管突破被动监管的窘境，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吃得省心。

落实“舌尖上安全”，重点是要加大惩处力度，把好“惩戒关”。在食品安全领域，惩戒力度小，违法利润高成为许多企业和个人违法生产和流通问题食品的源动力。许多企业在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时，往往是通过缴纳罚款、赔偿消费者的方式息事宁人，违法利润与惩戒力度存在巨大反差，助长了食品生产领域的不良风气。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就是要让相关企业和个人承受不起违法的后果，通过停产整顿，建立诚信档案、媒体曝光等方式让违法不仅影响违法企业的当下，也影响其今后的生产经营；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惩处范围，不仅要惩处违法生产者，对明知是问题食品的经营者，也应进行惩戒；就是要启动问责机制，对监管不力的监管部门、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要严肃问责。惩处是手段不是目的，打击维护食品安全的不法行为，就是为了震慑不法分子，使食品的生产、流通步入正轨。“食品产业是良心产业”，良心产业更需要法律的保障，只有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才能更好地以儆效尤。